

·旧学与新知·

主持人：徐 雁

·拂云楼·

## 陶渊明与藏书文化

刘尚恒 (天津图书馆 天津 200000)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东晋的陶渊明算得上一流的重量级人物,尽管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册薄薄的诗文集——总共一百三十四篇诗文,然而比起那些存世千篇乃至万篇的作者,他毫不逊色,甚或过之。这是笔者在学习和研究藏书文化中的感受,兹略述如下。

### 一 《陶集》收藏故事

陶渊明(365-427)名潜,字渊明,一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追赠大司马。可是到了陶渊明时,陶家已从显赫门庭跌至寒素之家了。陶渊明“少而贫苦”却好学有大志,历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他为人高洁,鄙视官场秽弊,解印挂冠而去,归隐园田,后来朝廷再征聘他为著作郎,亦辞而不就。他写下许多歌颂田园生活的诗作,也写下许多感怀世事,直抒胸臆的诗文。其诗文风格平淡,语言平易,感情真挚,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陶渊明诗文汇编成集始于梁昭明太子萧统,历代编纂不知凡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即有著录多种,书名或称《陶渊明集》、《陶征士集》、《陶潜集》、《陶靖节集》,篇幅或五、六、八、十卷不同,而历家笺注校释本尚不计在内。

久播人口的宋刻《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其收藏传递故事,先后有焦从海《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载《文献》1985年第3辑)、陈杏珍《宋刻陶渊明集两种》(载《文献》1987年第4辑)、李坚《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的递藏源流》(载《天一阁文丛》第4期)三文,考订精确,备述详尽,这里只作简单介绍。

《陶渊明集》十卷,南宋刻递修本,二册。据藏印和题识可知由明文彭起,传至毛晋、毛扆父子,后依次为黄丕烈、汪士钟、汪骏昌、杨绍和、周叔弢。《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宋汤汉注,南宋刻本,二册。据藏印和题识可知由明董宜阳起,传至

项禹揆,后依次为鲍廷博、张燕昌、周春、书贾吴东白、蒋梦华、黄丕烈、汪士钟、杨绍和、周叔弢。二书在黄丕烈、汪士钟、杨绍和、周叔弢处四次聚合在一起。

当初鲍廷博得《陶靖节先生诗注》时,因不知注者汤汉其人,轻易地给了张燕昌,张因其为金粟纸而宝,实际也不深知可贵之处,惟有周春了解汤汉其人,懂得此书可贵,花了二年时间软磨硬泡,最后以明代重一斤的叶玄卿“梦笔生花”大园墨换来,近于巧夺。周得此书后,与其所藏宋刻《礼》书并储一室,颜之曰“礼陶斋”,《礼》书卖去后,改名“宝陶斋”,最后连《陶靖节先生诗注》也卖了,再改名“梦陶斋”,可谓念念不忘陶渊明。黄丕烈先有宋刻《陶渊明集》,又以100两银子购得《陶靖节先生诗注》,二书第一次聚合在黄家,黄以二书颜其室名为“陶陶室”,并分别题写“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后又增以宋刻苏长公(轼)《东坡和陶诗》,从此“陶陶室”之名享誉书林。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海源阁书严重散失,其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携宋元秘本至天津售卖,周叔弢先生先买得宋刻《陶渊明集》,而宋刻《陶靖节先生诗注》落入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书商王雨(字子霖)之手,王居奇抬价,周先生为不使二书失群,以4000元高价(相当于当时四千袋面粉)将书买回(据《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1931年4月21日日记载:“周君以3650元购置购之。”)使二书第四次聚合,恢复黄氏“陶陶室”旧观。1952年,周先生将此二书连同其他宋元珍本书籍715种,慨然无偿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安然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库中,找到最好归宿。

### 二 室名斋号与陶渊明

室名斋号是文人们将自己的读书处、著书处、藏书处冠有的特定名称。因为这里是文人们的精神领地、精神道场,所以它们的命名是十分讲究的,不仅表现文人的才学和睿智,更是

他们的人生纪实和心灵独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室名斋号出于与陶渊明有关的,除上述周春的“礼陶”、“室陶”、“梦陶”诸斋号和黄丕烈的“陶陶室”之外,藏书史上指不胜数。

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归来堂”,即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赵为金石学家,李为女词人,二人同嗜金石彝鼎、书法帖的收藏、整理、鉴别,“竭其俸入以事铅槧,第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集题签,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夜尽一烛为率。”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这一段和美的夫妇生活,便成为文人乐传的兰闺佳话。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乌江人,居芜湖,绍兴进士,累官显谟阁直学士,著有《于湖集》等。明代文嘉(1501-1583)字休承,文征明次子,画家。张、文均有室名“归来堂”(文尚有闲章“归来”)。清叶树廉字石君,居虞山,性嗜书,家有“归来草堂”,其意义均同。

元虞集(1271-1348)字伯生,号道园,崇仁人,官至翰林直学士,工文,著有《道园类稿》。《元史》本传:“(集)早岁与弟槃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雍)诗,题曰邵庵。”

明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后以字行、更字征仲,号衡山,吴县人,著名画家,为“明四家”和“吴门四才子”之一,喜收藏,家有“停云馆”,刻有唐孙过庭《书谱》,著有《甫田集》。其室名“停云馆”,即取自陶渊明《停云》诗,其诗序云:“停云,思亲也。”

清初顾湄字伊人,江苏太仓人,本姓程,其父与顾梦龄友善,梦龄无嗣,遂出继顾氏,改姓顾。工诗,喜收藏,家有“陶庐”;著有《水乡集》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补·陶庐记》云:“顾子伊人得宋刻苏长公(轼)所书《陶渊明集》、藏弃斋中,晨夕吟讽,名其处曰陶庐。”顾湄与钱曾交谊最厚,见钱曾苦爱此书,遂举以相赠。康熙初年,钱曾将此书售于季振宜。季歿,书又散佚于市,顾湄终于又访得购回,再赠钱曾,成为书林中一段美谈。又清中期蒙古族诗人、学者法式善(1753-1813)字梧门,号时帆,其室名也称“陶庐”,三人取义皆同,即仰慕陶渊明其人。

清周亮工(1613-1672)字元亮,号栎园,祥符人,明崇祯进士,授御史,入清官户部左侍郎,能诗善文,家有“赖古堂”,收藏甚富,著有《赖古堂集》等。其室名取陶渊明《赠羊长史(松龄)》诗:“余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亮工又有闲章“学陶”印,示其以陶渊明为楷模。

清张惟亦号螺浮,海盐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给事中,好

收藏,家有“涉园”,传至现代出版家张元济,达六七代之久。其室名即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日涉园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示其避世俗之扰,求自适其乐。近代陶湘(1870-1940)字兰泉,号涉园,武进人,银行家兼藏书刻书家,室名也称“涉园”,其意同。

清钱谦贞(1593-1646)字履之,常熟人,谦益从弟,其子孙保字求赤,父子喜藏书,善校读,家有“怀古堂”。康熙间徐贞木字士白,号白榆,秀水人,工诗,善篆刻,也有室名“怀古堂”,均取意于陶渊明《和郭主簿》诗之一:“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示其思念古昔。

清姜宸宸(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慈溪人,官顺天府考官,家有“真意堂”,即取陶《饮酒》诗之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清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桐城人,康熙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家有“笃素堂”,喜收藏,著有《笃素堂诗文集》。其室名取自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意为讲信义,行忠孝,是人的善良行为;怀抱淳朴,坚守静默,是君子的纯厚素志。张英又有室名“陶庐”示仰慕陶渊明。

清陆日爱字曦叔,一字雪亭,青浦人,曾官浙江知府,家有“守拙斋”,著有《守拙斋诗文稿》。清解道显(1776-?)字小亭,天津人,官知县,也有“守拙斋”,著有《守拙斋诗集》。二人室名均取自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之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清姚鼐(1732-1815)字姬传,桐城人,乾隆进士,累官户部郎中,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为桐城文学派主将,室名“惜抱轩”,著有《惜抱轩文集》。其室名取自陶渊明《饮酒》诗之十五:“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意为假如不摒弃穷困显达的思虑,这是违背了朴素胸襟,真是太可惜了。

清郁礼字佩宣,一作佩先,号潜亭,嘉道间钱塘人,与厉鹗、鲍廷博友善,喜收藏,家有“东啸轩”。曾在街头拾字僧的背篓中得厉鹗散失的《辽史拾遗》手稿五十页,成为书林美谈。清查善和(1733-?)字用咸,号东轩,天津人,著有《东轩诗草》,室名“东轩”。二人均取陶渊明《饮酒》诗之七:“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表示愿在东廊屋檐下任情放歌长啸,就这样度过自己的生命。

清汪日桂字一枝,仁和人,乾嘉间贡生,与鲍廷博、朱文藻、吴騞友善,家有“欣托斋”(又称“欣托山房”)。杭世骏为之撰《欣托斋藏书记》(见《道古堂集》卷19)。清崇恩字仰之,号雨龄(一作语铃、禹龄),姓爱新觉罗氏,由廪贡生官至山东巡抚,工诗画,善收藏,家有“吾亦爱吾庐”。二人室名均取自陶渊明《读山海经》之一:“众鸟有欣托,吾亦爱吾庐。”意为众

鸟因有树木依托而欢欣,主人以屋里有藏书而喜爱。

清华长卿(1805-?)字枚宗,号梅庄,天津人,道光恩科举人,候选知县,工诗,著有《时还读我书屋文抄》等,其室名“时还读我书屋”,系取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表示忙完耕作后读书。

清虚谷(1824-1896)俗姓朱名怀仁,号紫阳山氏,歙县人,居扬州,出家后改名虚白字虚谷,以字行,画家,著有《虚谷和尚诗录》,其室名“觉非庵”,取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示其对往日的自我否定。

清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人,光绪举人,历任驻日使馆参赞、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参与戊戌变法,力主维新变革,工诗,著有《人境庐诗草》等,其室名“人境庐”取自陶渊明《饮酒》诗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意为生存在纷乱的人世间,躲是躲不开的,惟有心胸开阔,就会避开喧闹,如同处在偏荒之地。

近代黄侃(1886-1935)字季刚,号病蝉等,湖北蕲春人,从学章太炎,曾任北大、金陵大学等高校教授,精语言文字训诂之学,著有《黄季刚先生遗著》等。他有“量守庐”,藏书甚富,卒后悉捐于湖北省图书馆。其室名取自陶渊明《咏贫士》之一:“量力守故辙,岂不饥与寒?”意为掂量自己的能力,遵循固有的生活道路(方式),这样怎能不挨冻受饥呢?以此名室,示其不为饥寒所困,立志读书治学,传承民族文化。

现代冯雄(1900-1968)字翰飞,号彊斋,江苏南通人,毕业于唐山交大,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水利所研究员,家有“景岫楼”,喜收藏,通金石版本之学。其室名取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此外还有间接取于陶渊明事迹、诗文的室名斋号,如近代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晚居天津,著名医家,工诗,著有《种菊堂诗草》,其室名“种菊堂”,即取意于陶渊明事迹及诗文。陶渊明喜爱种菊、赏菊,写下很多赏菊诗篇,其中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之五)最著名。唐杜牧《将赴湖州留题亭菊》诗有云:“陶菊手自种,楚兰心有期。”以此名室,表示退藏自守,也示其仰慕陶渊明之为人。

### 三 闲章与陶渊明

闲章与名章同为印鉴中两大类。名章作为主人凭信符号,表示其拥有的权益为特征;闲章则不作为凭信符号,无主人姓名字号及斋馆室名,而它却与室名斋号章一样,反映主人家世、身世、功名、志趣、逸兴、祈愿,以及对人世、人生的感叹,并且突破姓名字号、斋馆室名的局限,驰骋空间大,具更深更浓的文化底蕴。以陶渊明事迹及诗文入闲章的,在藏书文化中

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明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山人,嘉兴人,他虽无功名,也不曾入仕,但他善治生产,家富资财,有“天籁阁”,藏书富且精,他有“小桃源里人家”印。其兄笃寿(1521-1586)字子长,嘉靖进士,官广东参政,家有“万卷楼”,喜藏书刻书,他有“桃花村里人家”印,不仅表示他们居住地桃树连苑,更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写的虚拟境界的向往。

明范大湖(1524-1610)字子宣,号讷庵,鄞县人,范钦从子,喜藏书,他有“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印。清余怀(1616-1695)字澹心,号无怀,莆田人,居江宁,善诗能书,著有《板桥杂记》等,他有“无怀氏之印”。清汤燕生字玄翼,号岩夫,安徽太平人,居芜湖,明末诸生,与萧云从友善,工诗词,善书画,精篆刻,他有“无怀葛天氏之民”印。三者均取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葛天氏为传说中古帝名号,在伏羲氏之前,其治不言而信,不化而自行,古人认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此三印示其主人对简朴而无忧生活的向往。余氏之印又兼有寓意其字之意。

明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进士,官至太仆卿。清陈奕禧(1648-1709)字元谦,号香泉,海宁人,康熙贡生,官至南安知府,工书及诗文。二人均有“乐琴书以消忧”印,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示其以抚琴读书自娱。

明薛素素号素卿,又号素君,润娘,长洲人,万历间吴姬,能画兰竹,作小诗,善挟弹走马,以女侠自居。为李征蛮所宠。中年长斋绣佛,后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翁。她有“素心人”印,又有“素心”印,语出陶渊明《移居》之一:“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既寓意其名,又示其本为心地纯洁之人。清王锡元字兰生,盱眙人,家有“十四间书楼”,藏经籍金石甚富,他有“乐与数晨夕”印,示其乐与经籍金石相处。

明江以周字号生平平仕履均不详。清张燕昌(1738-1814)字芑堂,号文鱼,又号金粟山人,海宁人,乾隆贡生,家有“娱老书巢”,喜收藏。二人均有“乐夫天命”印,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为随大造化而归于穷尽,乐天知命,有什么困惑和怀疑的呢!

明清之际的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易名晋,字子晋,常熟人,家有“汲古阁”、“目耕楼”,著名的藏书刻书家。他有“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朱文篆印,钤在明刻本《南丰先生(曾巩)元丰类稿》上,见《天禄琳琅书目》卷10著录,印文与清周亮工“赖古堂”室名同出陶渊明《赠羊长史(松龄)》诗。正是这枚闲章,充分反映毛晋一生对书的无限热爱和执著追求。他一生刻书多达600多种,版片11万片,抄书440



多种,时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在我国雕版印刷史和文化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沈白字涛思,号贲园,又号天儒子,明清之际华亭人。其兄沈荃为顺治进士,官翰林侍读学士,沈白却高隐不仕,以书画自娱,他有“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印,语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首句,示其对陶渊明隐居园田生活的仰慕。

清全檀字星轺,休宁人,迁居吴县,家有文瑞楼,藏书甚富,康熙末曾刻《贝清江集》、《程巽隐集》。他有“此中有真意”和“真意”两印,语出陶渊明《饮酒》之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表示书籍中含有自然和人类的真谛,无法用语言能辨析表达清楚。清初姜宸英室名“真意斋”,其意与此同。

清孙潜(1616-?)字潜夫,号菽园,句容人,嗜藏书,尤精于校勘,他有“校书亦已勤”印,语出陶渊明《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诗:“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据孙氏所留下的题跋校记,他从事校勘工作至少从顺治中期到康熙中期长达三十余年之久。

清毛扆(1640-1713)字斧季,号省庵,毛晋之第五子,承继父业,藏书刻书,著有《汲古阁秘书书目》,他有“采菊东篱下”印。清包芬字采南,乾嘉间仁和人,家有梅吟书屋,工书画,精篆刻,他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印(系丁纯所刊)。二印语出陶渊明《饮酒》之五。包虽取首尾二字与其字相合,寓意自我,但都示其慕陶渊明的田园生活。

清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人,乾隆进士,官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知县,晚居江宁,筑随园,有“小仓山房”、“所好轩”,藏书甚富,工诗文,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等。他有“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印,取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不求甚解”,实指得其旨意而忘却语言,心有所会,默不作声,不像那些腐儒津津乐道于章句细碎,舍本求末。

清马玉堂字笏斋,号秋药,海盐人,道光元年(1821)副贡生,家有“汉唐斋”,性耽书籍,杜门校勘,不谒官府,著有《十六国春秋》等。他有“游好在六经”印,语出陶渊明《饮酒》之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示其致力于六经,不外求,不外慕。六经指孔子删定的《易》、《诗》、《书》、《礼》、《春秋》、《乐》,也称六艺。其中《乐》亡于秦,故后称五经。

清周春(1729-1815)字苞兮,号松霭,海宁人,乾隆进士,官广西岑溪县知县,喜藏书,家有“著书斋”。他有“自谓是羲皇上人”印,语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羲皇指伏羲氏、神农氏、黄帝为三皇。羲皇上人谓伏羲氏之前的人,即自喻为太古时代的人。

清赵之谦(1829-1884)字汇搗叔,号悲庵,绍兴人,咸丰举人,历官江西鄱阳,南城等县知县,著名书画篆刻家,有“二金蝶堂”,喜收藏,他有“为五斗米折腰”印,反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晋书·陶潜传》)。此印示其做官虽非本愿,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奈何之情,跃然纸上。

近代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改名俊卿,字香圃,号匋庐,浙江安吉人,工书法、绘画,精篆刻,为一代艺术大师,他有“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说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经人保举,由县丞升任江苏安东县(今涟水县)县令,做了一个月县太爷就不干了,比起陶渊明做彭泽县令还少五十天(按陶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弃官,作《归去来兮辞》)。表示他不仅将官爵看得其淡如水,也表示他以陶渊明为榜样。

现代傅抱石(1904-1965)原名瑞麟,江西新喻人,美术大师,擅长画山水人物,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等职,他有“不知有汉”印,语出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示其专心绘事,不涉外界杂事。又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印,语出《归去来兮辞》:“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示其淡泊人生,怡然自适情怀。明项元汴(见上)也有“寄傲”一印,意同上。

此外还有暗取陶渊明事迹和诗文的闲章,如清席鉴字玉照,号茱萸山人,常熟人,家有酿花草堂、扫叶山房,喜藏书,又喜刻书,他有“桃源衣冠”印,即暗取《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人物。至于字号中称“陶斋”(如宋曹士冕、明袁表江、清翁大年、端方)、“陶庵”(如明清之际的黄淳耀、张岱)、“陶楼”(如清黄彭年)、“陶村”(如清程伯鸾)者,文献中屡见不鲜,皆系敬仰陶渊明所致,兹不一一赘述。

#### 四 一点思考

仅从以上笔者知见所录《陶集》流传故事,源于陶氏事迹和诗文的室名斋号及闲章,表明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文人心目中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以笔者所知,他在藏书文化中的“出镜率”之高,尚无第二人能及,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陶渊明生活在六朝时期,时尚流行文采以艳丽繁密为贵,他的平直恬淡的诗文之作不为时重,声名远不及同时代的谢灵运。钟嵘《诗品》将其列入中品,刘勰《文心雕龙》避而不提,沈约为之列于《隐逸传》却于他的文学无甚称许。一直到唐代,陶渊明才逐渐为人们认识其价值,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以他为楷模,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给予他较高评价,并借鉴他的诗文创作。宋以后其更加受到重视,不但评注其诗文

著述甚多,苏轼首创“和陶诗”109首,开后来和陶、仿陶诗作之先河。其他如王安石、欧阳修、陆游、辛弃疾,皆给陶渊明很高评价,等等。直至毛泽东写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若论中国杰出诗人,陶之前当以屈原为最,陶之后恐以李、杜称雄。以“香草美人”自喻的屈原,其洁身自爱固然令人仰慕不已,但与大多数文人相距甚远;以“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其仙风道骨般的气质,也非常人所有。杜甫官至左拾遗、工部员外郎。“安史之乱”社会大变动,使他颠沛流离,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也不是常人能经历的。就藏书而言,既是文人

诵读所资,又是文人自守善独,恬淡人生的感情寄托所在。陶渊明上无显赫门庭,享封荫之荣;中无显赫功名,煌煌政绩,下无贤子孙扬名于世而受封赠之宠,他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少虽有志,愿济苍生,救时世,然而官场的腐败昏庸(仅县令级的),迫使他只好退却下来,回到民间和自然之中,乐天知命,守着田园生活,这种思想和胸襟,最易得到大多数中国文人的认可和共鸣,陶渊明的平凡、坦诚、坚贞、淡泊、率直的人生和诗文更易打动人,这大概就是他“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原因所在吧!

·传声筒·

## 史料收集与旧书业的存在价值

谢 泳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厦门 361005)

一般的读书人,都懂得到图书馆去找材料,其实图书馆对研究者来说,不是读书的地方,是查书的地方。到图书馆前一定要有目的,知道材料的出处和图书馆是不是有收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除了使用图书馆的材料外,最好能养成逛旧书店的习惯。诸位知道,早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唐弢先生,就是一个新文学著作和期刊的收藏家。他去世后,把自己的收藏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几年文学馆专门就他的收藏,出了一本《唐弢藏书目录》(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非卖品),十六开本,厚厚一大册。

现在的旧书店,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的店铺,一是网上书店。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比较好的旧书店,一般说来中国好的旧书店,还是集中在文化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小地方,因为特殊的原因,旧书业也有相对规模,比如太原、石家庄这些中等城市。

传统旧书业的兴盛,是中国文化传播和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标志,中国老辈学者的学术研究,多有收藏和研究结合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收藏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罗振玉与甲骨文的研究,还有胡厚宣编辑《甲骨文合集》,旧书业的繁荣都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中国现在的旧书业,虽然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有旧书业的存在,总还是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现在的旧书业,和以往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旧书业类似于

古董铺了,凡有价值的史料,一般财力的人很难得到。但我们也要懂得,史料不一定是越有经济价值就越具文献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眼力。先有研究者的眼力,引起学者对相关史料的重视,随着相关史料学术地位的提升,当与此史料相关的研究成为显学时,这些史料的经济价值才能提高。

中国现代文学涉及的史料,当然不可与中国传统学问涉及的史料相比,但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现代印刷为基本特征的,所以报刊和作品流传的主要方式,如今还是在旧书业中进行。

旧书业不同于图书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的史料,可能都不成系统,但同时又是实物,容易激发研究者的学术灵感。诸位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在学术研究中,实物性的史料(直接史料),比文字性的史料(间接史料),更容易让研究者产生学术灵感。也就是说,依实物性史料做研究多有创新,而依文字性史料做研究,易于雷同。我们看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收集的史料,时间越久,越显示出它的价值。逛旧书店,是中国文人和中国学术活动中的一个主要方式。中国现代学术的衰落,如果换个角度观察,与中国旧书业的衰落有关系,因为没有繁荣的旧书业,学者的眼界会非常局限。

要求每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养成从旧书店中收集史料的习惯是不现实的,但懂得旧书业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却